

【後記—天使不敢走的路·傻子一路衝過去】

現在的時間是人民民主聯邦 15 年（人民民主聯邦元年為 1991 年），論文口試結束後的某年某月某個星期三之夜，「台社」在紫藤蘆舉辦了一個論壇：「第三勢力的想像與出路」。與我的論文研究頗有干係，特北上。席間，大家對於「第三勢力」在詞彙、走向多所爭議，甚至搞工運的楊偉中感慨批判十年間運動團體的原地踏步及未來運動方向持續未明。而「人民民主」這個詞彙繼上個十年和一個星期前的罷扁論壇：「台社對當前台灣政局的省思—政黨政治的危機與社會民主的未來」，在這個夜晚又被提出，雖仍多所爭議。身為九〇年代初期台灣「人民民主論」的幕後推手—丘延亮，感性地延伸陳光興的用語：人民民主不是一種政黨、不是一種政治傾向，認為「人民民主是一種生活態度」。

我想「人民民主」此刻的重提，如同我此刻重提《島邊》。《島邊》或許不再復刊，或許被評為不合現今的社會情境，但重溯《島邊》並非藉以取暖自慰，《島邊》背後所代表的聲音是現今台灣社會被藍綠所掩埋的、所遺忘的。

只是「人民民主」和《島邊》當初過於酷異化的風格走向了另類邊緣；而另類菁英化的論述與「人民」接合的錯位，加上缺乏對相互發話立場的體解，致使九〇年代中期無以為繼。「左翼」如何不再只是一種位置的宣稱和教義的信仰固著，不再是一種排除，而是含納。沒有統獨潔癖、政治潔癖，反被群眾的力量所接合？席間我的發言，雖未被正視及獲得回應，但我口試時的陽萎頓時有了宣洩的出口！！



《島邊》的研究對我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學術性的批判研究，不如說是我對自我成為「《島邊》迷」的研究。裡面或許沒有採取適度的批判距離，言詞不夠中肯客觀並衝動濫情，但若將其歸類為一種「迷文化」研究的話，我想那種主觀情感上的波動希望是可以被容許的，那種下意識的引用撰述，那種脫口而出的「島邊語言」是一種文化的表現，是一種迷的正常反應。

但是書寫的當中我又被迫必須不斷質問自己的是：為何我對《島邊》感到著迷？《島邊》抒發了我何種的情緒？我在《島邊》裡面看到了什麼？《島邊》真的解決我所面對的問題嗎？如何解決及為何不能解決？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運動者、也不是一個學術論述者、更不是歷史學家，我只是希望藉由對比《島邊》時期及《島邊》停刊十年後的社會，論述的轉進及運動方式的改變來了解我所處的這片土地上的究竟呈現的是何種生活樣貌？

但，無奈，《島邊》的年代是我的差異！！

《島邊》的閱讀與書寫過程中，我極力為自己塑造和試圖沉浸在一個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期解嚴前後的時空感中，想像著街頭外是動輒得救卻又進退兩難的喧鬧。

我想像著「心中有警總」的戒慎恐懼，我想像著在黨外人士政見發表會場上的慷慨激昂，我想像著中正廟絕食罷課最後離場的含淚悲憤，我想像著夜宿忠孝東路街頭冰冷的柏油路，我想像著農民請願運動衝突時在我頭上紛飛的棍棒，我想像著小蜜蜂一樣穿梭街頭到處游擊噴漆……，好多

好多慾望成為的身體！

我冀望我可以擁有身處那些社會佈景裡青壯年的成熟身體感覺，好讓我可以妥貼的書寫出那樣的年代、那樣的環境、那樣的心理感受…。

但腦中不斷穿插、復返著的，竟是我刻意壓抑、排除掉的「我的記憶」！另外一種「身體感覺」！

「解嚴」一詞對我的身體感覺並無太大的意義，它不在我的感知當中產生任何的改變，彷彿生活本來就是如此。

有的盡是消費型態的改變：第一次吃「麥當勞」漢堡時的驚奇、滿足，藉由夾著漢堡排的兩片麵包便自認吃進了「原來這就是美國」，產生一種莫名對美國文化的憧憬。第一次踏進「7-eleven」便利商店時，整齊、乾淨、明亮的空間感，使我立即就嫌棄起巷子那頭腐舊昏暗的「柑仔店」。更切身相關的是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成衣商場及進口名牌服飾的大量傾銷取代了傳統的西裝店和裁縫店，家裡的裁縫店轉型為委託行，進口舶來精品並兼賣一些珠寶首飾供其顧客搭配。

1987年11月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電視總是播映著煽情卻又極其真實的熱淚畫面，大家總是抱頭痛哭或是跪在死去的人墳前，焚香並淒厲吶喊。許多外省伯伯來家串門子的第一句問候總變成了「要回去看看嗎？」、「什麼時候要過去看看？」外省老伯準備啟程的前些天，總是會到家裡添購眾多金戒指、金項鍊，「買回去給他們當見面禮！」口中喃喃自語地盤算著遠在大陸親戚的人數有多少…，伯伯們回來時往往一個金飾也不剩，有的連領帶及衣服都被扒了去…。爸媽總是問「回去之後那邊現在怎麼樣了？」、「要再過去嗎？」伯伯們臉上總是悵然所失的搖搖頭：「不回去了！」、「回那兒去？我的家在台灣啊！」之後久了，大家就再也不提了，彷彿是去了一趟大陸「旅遊觀光」而已。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外省族群這些老伯們心中的感傷及無根的失落。

而另一方面的生活景象卻是爸媽從早到晚忙著招呼的不是我們兄妹三人的衣食起居或課業(日後他們也一直覺得愧對我們的「童年」…)，而是匯率急遽爬昇、股票萬點後從號子走出的「爆發戶」，和房地產飆高之後炒地皮的「田喬仔」。每個人手上像是有花不完或不知道如何花用的錢，出手闊綽地定製華服或添購首飾。委託行裡的企鵝、雨傘、鱷魚、YSL 等的進口名牌服飾或金飾珠寶像是不用錢般的迅速出清；而家中累積的財富也在號子裡、房產裡、大家樂、六合彩裡迅速散盡。回歸原點。

我的記憶，只是歷史記憶的極小片段…原來我不能只是學運分子、副刊寫手、黨外人士、女性主義者、同性戀、原住民…，我還得是進出號子的菜籃族歐巴桑、飛車奔馳的飆車少年、大家樂的簽注組頭、炒地皮的房屋仲介、…我不能只是一個我，要有很多個我、無數個我才能夠或永不能夠全備那段歷史的臉孔。後來我才明瞭《島邊》不是九〇年代的歷史全貌，它只是其中一個樣貌，跟國民黨所塑造的「民主化、現代化」的歷史；和民進黨所塑造的「美麗島、本土化」的歷史一樣，只是視角不同所構築出來的歷史窗口。

台灣經濟泡沫化(也相伴隨著社會力的泡沫)後，爸媽縱有埋怨，卻也沒對社會失望，總說：「那時，時機好，錢好賺，所以那些錢是加(多)出來的，料起(沒了)就算了！攔賺得有啊(再賺就有了)！只是現在較難賺，就賺攔少ㄟ！…我沒有親身見證到的是上層階級或知識份子及邊緣

弱勢團體在當時社會情境下的脈動，我只親眼見證台灣社會中下階層(縱使不夠資格成為「邊緣」)的「活力」！在資本、社會高低起伏快速變動的大環境下，為生存、求生活的伸縮性！

前時期的台灣社會的確開放出許多空間供其揮灑，諸多社運和知識份子也在其中攻下不少疆土，但當社會條件緊縮時，社會運動的工作者似乎只感嘆有志難伸，卻難以有這樣的伸縮性。對外要求「純粹」的訴求往往向內轉化：運動內部的運作是否民主化、是否也有「中心／邊陲」的壓迫性、是否有成為另一個權威／邊緣中心的嫌疑...，而這樣的內向自省轉化並沒有更加凝聚或提昇改造社會的動力，反而像個兩面刃殺了外面的敵人也砍了自己，或者反向造成內部的過分噤聲。

運動中的熱血及純粹性格，一直是我所景仰的，但，不是全有就是全無的零合邏輯，似乎折刺了不少人沸騰的激情、還有年輕尚未成形便夭折的理想！

* * * * *

記得口試時被問及到「我的左翼位置」，或許我可以很虛無、取巧地說：「任何位置都可能是我的位置」，但我喉頭一哽，難以回答。什麼是「左翼」？什麼是「位置」？什麼又是「我」？研所四年似乎未能讓我回答這個問題！也許一輩子也回答不出來，甚至忘卻這個提問...

選擇為《島邊》書寫，並非是想去責難或是去挑撥當時的衝突矛盾，反而希望藉由自己的書寫，重新開啟每個發話位置對話的機會和相互的理解。重新檢視當初解合的因素，是為了逃離不斷重複的錯誤；如果漠視當初解合的原因，此刻論述的重提和尋求重新的接合，則顯得沒有意義！

原本希冀從個人的生命史串聯出相同世代的生活方式或世代之間的差異感，可以形成一個具有空間感的「島邊史」。但一方面自己書寫技巧的魯鈍難以呈現；另一方面諸位口試委員也均對這樣的書寫方式提出異議。劉紀蕙老師直接點明部分文章片段過於零碎、無意義並淹沒研究者自己的聲音；林文玲老師更相當貼切地點出本文對訪談稿的排置，不像「對話」，而是偏向「焦點團體式」的書寫；陳光興老師更認為像在「寫腳本」，因為說故事的人(也就是「我」)沒有出場；還有就是柯裕茶老師長久不斷直指我書寫的盲點：太易受「受訪者」及「研究對象話語」的影響，希望我可以將「島嶼邊緣」當作一本「電視周刊」來研究。.....其實說直接一點就是我成了太容易「上身」的「學術靈媒」，學不會「退駕」。對《島邊》的「去神聖化」成了首要的功課，並開始針對諸位口委的評論，對文章作某種程度的精簡、修改。

我開始到處撿拾碎片，深怕漏了一塊，就無法完整「島邊」。...腦中閃過的盡是一幅幅「倒邊份子」的臉孔，受訪的模樣，訪談間的互動...。經過訪談和閱讀，愈接近、愈進入...，內心就愈排拒、恐慌...，害怕去定義、去詮釋「何謂《倒邊》？」

訪談和書寫的過程中，我清楚地知道，我並非主導者，反倒像個被用以爭奪「倒邊」詮釋權的一只「棋」。有些人選擇多說，有些人選擇少說，有些人選擇不說。說了的，說了多少？怎麼說？沒說到的又是什麼？當中的意涵及利害折衝我難以進入並分析。而我又如何以有限的訪談去面對無限的未受訪者和閱眾觀點？成為口試後的思考。

停筆才體悟，《倒邊》這個潘朵拉的盒子，真是「傻子」才會開！！

但我仍在撿拾碎片！而你們還有什麼沒說的？

2006.07 彰化